

# 战后日本思想空间中的大江健三郎<sup>[1]</sup>

熊淑娥

**提 要：**大江健三郎研究长期以来集中于主题、方法和背景的文学性侧面，忽视了其社会性、时代性的思想性侧面。在思想史语境中考察大江健三郎文学中的天皇制、美国与核三大论题，具有理解战后日本人心灵意识、社会变迁和对外关系等多方面意义。和平与民主主义是战后价值观的特征，大江健三郎是民主主义的终生拥护者，但这位曾经的皇国少年内心对天皇崇拜仍有某种程度的共鸣，其思想中的矛盾性体现了战后民主主义的缺陷。在经济发展、代际更替和社会意识变化过程中，思想文化界没有输出满足人们价值需求的观点。结果上，融合了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主义元素的象征天皇依然是日本人追求超越性价值的归结所在。

**关键词：**战后日本思想；大江健三郎；天皇制；日美关系；核

## Oe Kenzaburo in the Postwar Japanese Intellectual Space

Xiong Shue

**Abstract:** Oe Kenzaburo studies have long concentrated on the literary side of themes, methods, and contexts, neglecting the ideological side of their social and contemporary nature. Analyzing the three major theses of the Emperor System, the United States, and nuclear problems in Oe Kenzaburo's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has multiple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ostwar Japanese spirituality, social change, and foreign relations. Peace and democracy characterize postwar values. Oe Kenzaburo was a lifelong advocate of democracy, but the former imperial boy still had some degree of empathy for emperor worship, and the ambivalence in his thinking reflects the flaws of postwar democracy.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generational change and changes in social consciousness, th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community has not exported ideas and views that satisfy people's value needs. As a result, the symbolic emperor, who blends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and modern democracy, remains the locus of the Japanese quest for transcendent values.

**Key words:** Postwar Japanese Thought; Oe Kenzaburo; Emperor System; Japan-U.S. Relations; Nuclear

## 一、战后思想史中大江健三郎的位置

日本思想史中的战后，首先意味着二战战败时的政治混乱、经济虚弱和精神虚脱，因为明治以来形成的社会秩序以及支撑它的文化价值体系突然崩溃了。二战后日本出现了野间宏、埴谷雄高、加藤周一和中村真一郎等“第一战后派”与大冈升平、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和堀田善卫等“第二战后派”，以区别于上一代“战中派”。“战后派”借用了一战后法国和美国等地艺术上出现的“战后倾向”（après-guerre）一词，用以描述否定和切断与上一个时代的价值规范、审美取向、生活态度等联系的倾向以及感到虚无颓废的人。一战给欧洲带来的是传统的破坏，而日本的情况是，不是一战而是二战摧毁了天皇这一国民的精神权威并改变了战时体制下的世俗生活。

文学家是对“战后”意识和时代潮流最为敏感强烈的群体。同欧洲一样，这种“战后”意识也是“断裂”与“创造”的意识，而且以追求自由灵魂立于真正自由境地的意识为基础，文学家又最为重视灵魂的自由。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文学家的终生课题。政治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现实，个人面对政治状况亦不可避免地需要做出反应乃至抉择，至于以何种方式来参与则是个人的自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选择以小说、随笔和演讲等文学的方式积极发声。

大江健三郎文学创作的特点之一，是始终与日本社会和整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紧密联系。天皇制、美国与核问题是大江健三郎文学的三大主题，也是战后日本思想史的重要论题。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1976年4月至7月大江以客座教授身份在墨西哥国立大学集中授课，他每周一次使用英语讲授的课程名称就是“日本战后思想史”。“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将其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相连接”<sup>[2]</sup>，不仅是理解大江健三郎文学基本风格的方法，也是解读大江健三郎在战后日本思想史中位置的线索。

学界对大江健三郎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并且积累许多有启发意义的成果。总体来看，现有大江健三郎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江健三郎文学主题<sup>[3]</sup>和创作手法<sup>[4]</sup>研究；二是大江健三郎对外国经典作家的接受研究<sup>[5]</sup>；三是日本以外国家和地区对大江健三郎作品的接受研究<sup>[6]</sup>；四是大江健三郎文学思想与社会和时代等关系研究<sup>[7]</sup>。

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发现既有研究大多是基于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家身份展开，忽视了他作为思想家的一面，因而对于其在战后日本思想史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的讨论似有不足。本文主要围绕思想而非文学展开，换言之是从文学入手探讨思想，以下主要以大江健三郎的著述为线索，讨论战后思想史中天皇制、美国与核这三个重要论题，同时从大江思想的矛盾性剖析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缺陷。

## 二、天皇制

天皇形象贯穿于大江早期的《十七岁》、中期的《同时代的游戏》和晚期的《水死》等作品中。“纯粹天皇”是大江在《十七岁》及其续篇《政治少年之死》两部作品中独创的意象。大江对“纯粹天皇”中“纯粹”一词的定义是：并不是指道德上的纯粹，而是指认知上的纯粹，如

何去认知的问题。<sup>[8]</sup>

作品描绘了“在大城市沙漠里沙子一般卑微无力”的“我”受到皇道派演讲者的感染，幻视出“黄金人、神、天皇陛下”，抛弃个人灵魂的恐惧，跳进纯粹天皇的伟大熔炉里与其融为一体，成为“天皇陛下赤子”，自觉受到天皇启示而刺杀左派政党委员党，之后于少年鉴别所“作为尚未出生的人在纯粹天皇的、天皇陛下”的“胎水之海”漂浮后自杀身亡的故事。<sup>[9]</sup>

“天皇陛下赤子”和天皇陛下“胎水”的描写，使得“纯粹天皇”集男性、父性与女性、母性特质于一身，不同于高居近代日本社会父权制原理顶端的天皇应为男性的传统形象。这个故事的原型显然是1960年10月刺杀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次郎的十七岁少年山口二矢。大江描写的右翼少年对“黄金人、神、天皇陛下”的感受与其在战争期间身为“皇国少年”的经历有关。“天皇陛下万岁”这句话也曾经支配着大江这个日本山村少年的国家观、社会观和人类观。<sup>[10]</sup>

1935年1月31日，大江出生于日本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现内子町）。1935年这个年份，是未来的轴心同盟三国继续滑向二战深渊的一年：3月16日纳粹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10月3日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亚；日本在中国制造了一系列蚕食侵犯华北地区的“华北事变”。同年日本国内发生了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美浓部达吉主张天皇作为国家最高机关实行统治，统治权本身不属于天皇而属于国家的“天皇机关说”事件，他的学说遭到陆军和右翼攻击，随后受到禁止发行著作的处分。8月和10月，冈田启介内阁两次发表“国体明征声明”驳斥美浓部的学说，明确统治权的主体在于天皇。最终美浓部达吉被免

于以不敬罪起诉，但是被迫辞去贵族院议员职务。

“天皇机关说”事件和次年的“二二六事件”，说明当时天皇的绝对权威已经渗透日本社会，军部势力几乎掌握了政治话语权。在此意义上，如果说1910年代至1920年代出生的日本人尚且能够感受到些许大正时代的自由氛围，1930年代后生人则自一出生就生活在绝对天皇制的空气当中。因此，在大江的认知经验中，“陛下赤子”不是皇后的孩子，而是天皇的孩子，“天皇形象正是作为母亲形象的天皇”<sup>[11]</sup>。

1941年4月大江进入国民学校小学之前，3月日本政府颁布了“国民学校令”。

“国民学校令”是从国民教育层面加强战时体制的政策。例如，学生在学校甚至不能直视天皇的“御真影”，直视即为对天皇不敬<sup>[12]</sup>，将受到教师责罚。战时体制下军部恣意用权，破坏了当时日本社会的日常规范。<sup>[13]</sup>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接受了GHQ（联合国军总司令部）主导的民主化改造，其中一项内容是废除为战时动员体制服务的教育制度，开始实施名为“六三制”的新制度，即小学六年制加中学三年制。正是在这项制度下，1947年4月大江升入新制大濑中学一年级。1947年5月3日，以象征天皇制和放弃武装为最大特征的《日本国宪法》正式实施，新宪法通过将“统治权的总揽者”改换为“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的方式保留了天皇制。

新宪法施行后，自1948年至1953年期间，以文部省发行的《民主主义》为教材的新制中学社会科目，取代了旧制中学以忠君爱国的道德教育为内容的修身课，这对大江的思想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主

权在民”的思想和“放弃战争”的承诺，“成为我日常生活中的根本规范，其发端便是新制中学的宪法课”。<sup>[14]</sup>作为战时体制下的国民学校小学生，大江在修身课上受到天皇是思想上绝对权威的教育，是随时可为天皇赴死的皇国少年，现实中却是直视“御真影”便要受到教师殴打责罚，思想和身体是错位的关系。作为新制中学生，新宪法同步解放了大江的思想和身体，为其后的人生实践赋予了根本规范。

此后，大江终其一生坚持民主主义立场。<sup>[15]</sup>1994年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大江诺贝尔文学奖后，日本政府亦有意授予其由天皇亲授的文化勋章。大江对此表示拒绝，理由是“在这个彬彬有礼的国家，这几乎是闻所未闻的公开侮辱，尤其是因为天皇也参与其中。”<sup>[16]</sup>“天皇陛下万岁”这句话甚至激发了这位有着50年以上创作经验的作家在文学上的彻底反省。<sup>[17]</sup>在2009年出版的晚期代表作长篇小说《水死》中，大江塑造了“杀王”的情节，展现了其对于天皇制的坚决态度。

### 三、美国

如果说天皇制是日本人必须面对的传统的问题，那么美国是日本人必须面对的不可忽视的、内化的问题。大江作品对日本与美国关系的描写分为两类，一是希望摆脱屈辱地位但以失败告终，二是从希望摆脱转变为反抗。第一类可见于其早期短篇小说《人羊》，描写的是大学生在公共汽车上偶遇的美国士兵与其他日本乘客之间的关系。年轻的美国士兵带着日本女性，但日本女性根本不看日本乘客，但其他乘客却为日本女性同胞和美国士兵在一起感到羞耻。车上日本乘客

因为一件小事，被美国士兵命令脱掉裤子，像羊一样被敲打屁股。美国士兵下车后，日本乘客分成了教师等组成的要求告发美军士兵的一派和大学生等拒绝加入的一派。大江不仅直接描写了日本在此事件所象征的日美关系中感到屈辱的心理，更是敏锐地注意到了日本人之间对待美国态度的分歧。

大江的小说基本上是在真实与虚构的平行以及后者对前者的颠覆和覆盖中进行的。<sup>[18]</sup>《万元延年的Football》便是这样一部运用传说与现实虚实交织、过去与现在时空穿梭的手法，将1960年东京发生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与1860年在其家乡四国森林中发生的两次农民暴动融会而成的小说。1860年正是脱藩志士暗杀未经天皇敕许便擅自与美国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弼的年份，而1960年是《日美安保条约》修订的年份，100年来历史与现实形成绝佳的对照，现实与虚构甚至难以区分。

大江笔下的虚构始终是针对真实而言，是真实的影子。他的晚期作品《优美的安娜贝儿李 寒颤彻栗终逝去》也是日美关系现实的隐喻。女主人公的名字“樱”显然是指代日本。无论是虚构的少女时期受到美军养父凌辱后又在其指导下走上演员道路的女主人公樱的形象，还是真实经历过驻日美军占领带来的创伤，高中时期又在GHQ美国文化情报教育局设立的松山市美国文化中心图书室内痴迷阅读的作家大江本人，作品内外的虚虚实实都显露出美国的影子。

大江少年时代所理解和成年后所描绘的具有女性和母性特质的天皇形象，不禁令人想起麦克阿瑟同昭和天皇的那张著名合影。在麦克阿瑟所代表的高大的美国

形象旁边，是昭和天皇所代表的相对矮小又略显拘谨的日本形象。二战后美国盟军占领日本的事实，使得曾经完美地构成日本社会父权原理核心的君主——天皇，只能拘束地站在一位高大的外国人身边。而且，这位高大的外国人是作为日本人父亲之上的“父亲”出现，在日美权力关系中占据主导的男性角色，而曾经的日本人父亲却是处于依附地位的“女性”角色。当然，只从性别角色出发以“婚姻关系”<sup>[19]</sup>来描述日美关系未免失偏颇，但这种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真实性，因为它正是战后日本在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写照。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天皇形象角色的反转与权力地位的反转，使得日本人不得不接受高大的美国人新“父亲”强加的世界观，同时否定了“母亲”即日本人一直以来习惯了的生活价值<sup>[20]</sup>。日本人因此在心理上感受到了一种欺骗的感觉和难以描述的痛苦。另一方面，战后日本人对于美国价值的内化又毫无自觉，丧失了自我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日本人的内心深处已经被彻底地“美国化”了。江藤淳的《“儿戏”的世界结束之时》指出，在日本人的“意识深处”，总是潜藏着“美国”二字。由于“美国”时常夹杂在日本人的“意识”和“现实”之间，所以日本人没有办法切身感受到“现实”，而只能生活在如同“儿戏”的世界里。<sup>[21]</sup>

然而，日美关系是一个短期内似乎无解的命题。一旦日本拒绝美国的庇护，废除《日美安保条约》，就会从根本上动摇日本的安全保障体制，日美关系将陷入决定性危机，因此这是一个政治禁忌。正因为如此，保守派才能安然于一种近乎屈从的“亲美”状态，革新派才能一边怀揣

着对美国的依附心理一边高喊“反美”口号，由此形成了江藤淳所形容的“儿戏”世界”。<sup>[22]</sup>“儿戏”世界背后的残酷现实是，即便日本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也难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日本的经济增长反而越发促使美国要求日本扩充其军事力量，结果是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在安全保障层面的对美依赖。更为残酷的事实是，只要日本在国际政治中对对美依附地位不变，日本的战后就不会结束。<sup>[23]</sup>日美在政治军事上的现实深深地影响着战后日本人对于美国的认知，而这种别扭的对美感情一直持续至今，并将继续持续下去。

#### 四、核

战后日本思想史中的核问题，超越了日本人内在的天皇制和内化的美国这两个问题，具有全球性意义。毋庸讳言，核问题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自然是因为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在二战末期经历了核爆，而它能够持续被讨论不仅与奉行现实主义的日本政治外交政策有关，也与国际格局变动相联。现在因为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日本的核问题再次引发全世界的关切。囿于文章主题，在此尝试分析大江对核问题的思想变化经历，力求管窥战后日本思想的一端。

大江对于核问题的思考，可以借用其著《核时代的想象力》这一书名来概括。该书是1968年他在东京新宿纪伊国屋书店连续十一场演讲的记录。堀田善卫曾经评价道：“对于日本的所有事物，从维新百年到战后今日、从自由民权到数次战争，再到广岛和冲绳。世界、历史、核爆，（大江君）要讲述的都是围绕在我们生存周边的事物。”“大江健三郎君对此具有

强烈的责任感，他认为如果不讲述所有这一切，则对人们没有尽到自己生而为人的责任。”<sup>[24]</sup>

实际上，大江对于核问题的思考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他的朋友田中良之死是第一个契机。1960年8月大江访问了广岛，他写道“如果广岛遭遇核爆的人们过着封闭在黑暗洞穴里的生活，我衷心地如此希望：请从孤单一人的不幸巢穴中走出来，加入我们日本人家人的友谊之环中。我们日本人都对广岛的人们具有重大的责任。而且，这段历史开始后经历了不幸的广岛人，都是我们日本人的良师。”<sup>[25]</sup>这段话中暗含着将遭遇核爆的广岛人与未遭遇核爆的日本人区别对待的意味，还不能说此时的大江对于核爆有着深刻的认识。

广岛之行结束后，由于《政治少年之死》受到了右翼猛烈攻击等原因，1960年下半年大江开启了东欧之旅，在巴黎借由朋友田中良的帮助采访了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他曾经回忆起田中生前曾提到核战争的恐怖性，1962年10月“从电视上得知古巴导弹危机的消息时，我感到深深的恐惧。四五天后我收到在巴黎的国际政治问题专家朋友田中良自杀的电报。我再次感到深深的恐惧，感觉战争或许已经开始了。”<sup>[26]</sup>正是田中良之死，加深了大江对于核战争的忧虑，刺激其此后更积极地思考核问题。

大江对于核问题认识转变的第二个契机发生在1963年。这一年先是他的长子大江光出生了，光的头上自出生起便长着一个肉瘤；接着是大江到广岛采访核爆受害者。这两件事促使大江认识到核时代的现实威胁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以广岛采访为经历写作的《广岛札记》里，大江更多地是在思考日本在核时代的对策，

强调“有必要在经历核爆二十年后确立新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态度，而广岛的那些正统的人们，正是我心目中日本新的民族主义积极象征的具体形象。”<sup>[27]</sup>

1945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核弹，给日本人带来了难以抹去的记忆和伤痛，可以想象日本人对核问题的敏感。值得注意的是，核爆文学是日本文学家的独创门类，大江健三郎是其中最具代表的作家，他在文学作品和社会实践中声援核爆受害者的努力，成为构筑后广岛文化理论的核心人物。<sup>[28]</sup>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上段引文中大江的主张也显然流露出一种受害者意识过渡泛滥的“核爆民族主义”，而忽略了广岛核和长崎为什么会遭遇核爆。

大江1965年对冲绳的访问是其核认识变化的第三个契机。埃德温·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在20世纪60年代初担任过美国驻日大使，他曾经形容冲绳为“战后在亚洲建立的唯一一块‘半殖民地’领土”。冲绳与本土分离所产生的怨恨一直持续到1972年美国将施政权归还日本甚至以后。国家的精神分裂体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上，而“旧金山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这种两极分化。<sup>[29]</sup>大江在访问中发现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经历者竟然被安置在没有专业医生的冲绳，而且“旧金山体制”下的冲绳居然不在自己视为信仰的战后宪法效力之内。此后，他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冲绳，意识到冲绳是美国在日本的核基地，而这种意识也反映在《冲绳札记》等作品中。

对于当代世界的责任感和核时代的恐惧感，是大江的两卷本长篇小说《洪水淹及我的灵魂》的主题。它以左翼组织“赤军”在浅间山庄发生的内讧事件为背景，

讲述了主人公大木勇鱼为了逃避核恐惧，幻想地球发生核爆炸、地壳大变动、洪水开始淹没人类社会。他躲入核避难所，但也难逃被现存体制的“洪水”淹没的命运。这部小说是大江对日本社会现实的批判和一种精神焦虑的反映。附带一提，此书获得1973年第二十六届野间文艺奖，大江在谈到一百万日元奖金的用途时，表示要把这笔钱“分成两份，分别赠给山口县遭受核弹爆炸伤害者福利会馆‘yuda苑’和杂志《冲绳体验》”。<sup>[30]</sup>

“同时代”一词恰当地诠释了大江文学思想中的现实意识和时代意识。大江曾经说“逐渐明白自己想要写的，是用个人的声音，通过自己的内心，来书写自己的历史，来书写自己的场所、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土地之历史。”<sup>[31]</sup>2011年“3·11大地震”和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大江回忆起1945年8月6日，表示日本再次发生“同样的灾难”是“对广岛最明确的背叛”。<sup>[32]</sup>他在连日收听收看电视广播的过程中决定将所思所想以表现内心思考的最根本手法——小说的形式展现出来，这就是《群像》2012年1月号开始连载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晚年样式集》。大江文学的思想魅力就在于其创作反映的是日本和时代的关切，能够持续为读者提供思考战后日本思想问题的线索。

## 五、从大江健三郎思想的矛盾性看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缺陷

20世纪世界主要由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及其带来的三个“战后”时期构成。较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以《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为基础奠定的二战以后的

国际秩序格局至今影响深远。二战以后这一意义上的“战后”，对亚洲的战败国日本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日本思想史语境中的“战后”，具有切断与战前大日本帝国的联系、重塑政治社会体系和精神价值的内涵。和平与民主主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战后价值观的体现。这两个词语所代表的战后思想状况，也随着日本的政治演变、经济起伏、社会流动和世界格局动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对立与分化。

1945年至1950年，也就是大江健三郎10岁至15岁的期间，是“日本战后最具严肃教育意义的五年间”<sup>[33]</sup>。大江从旧制小学升入新制中学，经历了从规定天皇绝对主权的明治宪法到规定象征天皇地位的战后宪法的根本性转变，其思想中带有以战后宪法为支柱的民主主义的深刻烙印。195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进入起飞阶段，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变化。不过，尽管经济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却没有解决日本人的问题。大江自言“自己是一个充满许多矛盾的日本人”。<sup>[34]</sup>

上文提及以浅沼次郎被刺事件为原型创作的《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两部作品，是大江对受到修订安保条约刺激的战后日本人意识形态混乱的讽刺。“只要是不愿意天皇荣光的人，谁都可以。问题不在刺杀的对象那一方，而在刺杀这一方（着重号为原文所加）。”<sup>[35]</sup>问题就出在战后日本人失去天皇这个绝对性价值权威之后精神陷入空虚。大江本人自认“虽然从内心参加到了安保斗争里去，可与此同时，对于这场斗争对立面的那些国家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天皇崇拜的右翼青年，似乎也产生了同感”<sup>[36]</sup>。

“虚妄”一词是战后民主主义思想逐渐丧失活力和遭受质疑的体现。1964年

战后民主主义开始成为日本思想言论界焦点，起因是经济学家大熊信行发表了《日本民族》一文。该文主张GHQ的占领是军事占领，而军事占领是战争的继续。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战后”应该始于“旧金山和约”生效的1952年4月28日。而且，日本自明治以来就已经有民主主义的传统，所以说民主主义是占领军带来的是错误的。“一言以蔽之，在军事占领下存在政治上的民主主义这一观点乃是虚妄。”<sup>[37]</sup>对此，丸山真男疑似回应道：“就我自身的选择而言，比起大日本帝国的‘实际存在’，我更愿意为战后民主主义的‘虚妄’许下赌注”。<sup>[38]</sup>

1960年代是日本知识分子失去权威的时代。以安保斗争失败为开端，进步知识分子群体走向瓦解。在1968年东京大学事件开始后，甚至连丸山这样的思想权威都遭遇学生的身体攻击。<sup>[39]</sup>究其背景，一是战后升学率上升，大学毕业生等高学历人群越来越庞大，稀释了高学历的光环；二是像大江这样生于1930年代、在敏感的少男少女时期经历战败的一代成长起来了，而被美国占领的经历在他们内心或多或少留下一些难以释怀的屈辱感觉；三是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淡化了日本人的战败记忆。日常生活、代际更替和思想意识的变化促使人们寻找新的价值。

必须指出的是，除了战后宪法宣扬的民主主义理念外，所谓的进步知识分子并没有为精神上感到虚脱和屈辱的日本人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观点。林茂认为，以荒正人为代表的“近代文学”只是日本战后的过渡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它更能显示出“战后”的性格，即政治、社会和伦理融为一体生命再出发的抱负，强烈的时论性质，追求“友情”的团体目标，并因此

形成相互对抗，这些都被误以为是混乱时期所需要的特征。而且，这一群人太过固执于个人的直接经验而导致视野狭窄等因素，使得他们在主观上可能“很高贵”的活动未能取得任何成果。<sup>[40]</sup>

大江在《无信仰者的祈祷》的演讲中，明确表示自己没有信仰，但他这样的无信仰者也会有只能称之为“祈祷”的心灵体验。<sup>[41]</sup>1935出生的大江在年龄上要比拥有战争体验的第一、二战后派小大约10至20岁。从他的思想轨迹和人生实践来看，可能对战后宪法所内涵的民主主义有一种类似于宗教般的信仰。《人间宣言》使得昭和天皇从战前的“现人神”变为战后的“人”。尽管战后宪法规定了天皇的象征地位，但日本人的精神信仰一下子被抽空，于是战后民主主义取代天皇神格，成为一种“世俗化的宗教”<sup>[42]</sup>。对超越性存在以及主人公仰视这种超越性存在的描写，是大江小说的又一特征。大江希望“尽可能与地上、天上的各种权威毫无交集地生活下去”，但同时也有一种希望最后把自己这具民主主义的灵魂与肉体献作燔祭的心情”。<sup>[43]</sup>

大江这种坚定维护和持续思考战后民主主义精神的日本人是罕见的少数，大多数普通日本人只是把自己依托在一种名为“一亿总中流”的同温层幻象当中。许多国家在1990年代陷入了丧失理想和希望的困境，人们的心灵也随之陷入迷茫。当接连遭遇阪神大地震、东京地铁沙林事件、“3·11大地震”和福岛核泄漏事故等重大灾难时，日本人的精神危机日益显现。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延续了日本国体的象征天皇制与民主主义的矛盾被淡化了，融合了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主义元素的象征天皇的作用被放大了。对于正在寻找新的价值的日本人来说，



天皇仍然具有超越性意义<sup>[44]</sup>，是日本人追求超越性价值的归结所在。

因此，尽管核爆给日本人带来的精神创伤是事实，但随之而来形成了受害者意识以及受害者意识泛滥也是事实。后者模糊了战争的残忍性，淡化了日本人作为施

害者给亚洲邻国人民带去无法磨灭的伤痛的事实。而且，只要日本人仍然视天皇为精神象征，就无法彻底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战后日本就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战争反省，也就无法形成批判性历史意识以克服民主主义的缺陷。

#### 注释：

- [1]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日本的‘战后’概念及其国际比较研究”课题（编号：2021YYZX003）研究成果。根据本人2023年5月21日在“第五届大江健三郎文学研讨会”上的报告修改而成。
- [2] 大江健三郎「あいまいな日本の私」、『あいまいな日本の私』、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3頁。
- [3] 菊間晴子『犠牲の森で——大江健三郎の死生観——』、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23年。许金龙《〈水死〉的“穴居人”母题及其文化内涵》《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4):189页-205页。黒古一夫『大江健三郎論——森の思想と生き方の原理——』、東京：彩流社、1989年。
- [4] 成田龍一「方法としての『書き直し』・序説：いま、大江健三郎をよむこと」『群像』2019年11月号、83頁-148頁。吴晓都《生活·想象力·现实主义——大江健三郎文学观念概评》《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7):76页-78页。陆建德《互文性、信仰及其他——读大江健三郎〈别了！我的书〉》《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6):36页-46页。
- [5] 万海松《大江健三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月13日，6版。陈众议《逆水行舟：大江健三郎文学思想蠡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40(4):38页-44页。许金龙《“始自于绝望的希望”——大江健三郎文学中的鲁迅影响之初探》《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11):30页-40页，52页。
- [6] 高华鑫《1960年安保运动与大江健三郎的中国之行》《外国文学评论》2020年，(2):90页-110页。叶琳《综论大江健三郎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11):7页-15页。
- [7] 成田龍一「大江健三郎の『戦後』をめぐる、いくつかのもの」『ユリイカ臨時増刊号 総特集\*大江健三郎——1935-2023——』、2023年、55(10):260頁-276頁。许金龙《“杀王”：与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对决——试析大江健三郎在《水死》中追求的时代精神》《日本学刊》2011年，(02):112页-125页。小森陽一『歴史認識と小説——大江健三郎論——』、東京：講談社、2002年。
- [8] 大江健三郎《大江讲评》，彭小妍编著《大江健三郎——从自我到世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1年，41页-60页，111页。
- [9] 大江健三郎著，郑民钦等译《政治少年之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40

頁-42頁, 129頁-133頁。

- [10] 大江健三郎著, 熊淑娥译《来自“晚期工作”之现场》《作家》, 2010年, (8): 2頁-3頁。
- [11] 大江健三郎。『小説のたくらみ、知の楽しみ』、東京: 新潮社、1985年、110頁。
- [12] 大江健三郎「戦後世代のイメージ」『厳肅な網渡り』、東京: 講談社、1991年、23頁。
- [13] 井上寿一『戦前昭和の社会 1926-1945』、東京: 講談社、2011年、229頁。
- [14] 大江健三郎「戦後世代と憲法<上>」『朝日新聞』1964年7月16日、11ページ。
- [15] 熊淑娥「貫いた個人の良識と責任: 思想史研究者が読み解く大江健三郎」『人民中国』2023年5月号、75頁。
- [16] James Sterngold, “Japan Asks Why A Prophet Bothers”, in The New York Times, Nov. 6 1994, p5.
- [17] 大江健三郎著, 熊淑娥译《来自“晚期工作”之现场》《作家》, 2010年, (8): 2頁。
- [18] 陈众议:《真实与虚构——大江文学想象力刍议》, 彭小妍编著《大江健三郎——从我到世界》, 台北: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2011年, 205頁-206頁。
- [19] 大澤真幸『戦後の思想空間』、東京: 筑摩新書、1998年、62頁。
- [20] 江藤淳『成熟と喪失——“母”の崩壊——』新装版、東京: 河出書房新社、1988年、173頁-174頁。
- [21] 江藤淳「『ごっこ』の世界が終わったとき」『一九四六年憲法——その拘束——』、東京: 文藝春秋、1995年、99頁-123頁。
- [22] 米原謙『増補版 日本政治思想』、京都: ミネルヴァ書房、2017年、280頁-281頁。
- [23] Bruce Cumings, “Japan’s Position in the World System”, in Andrew Gordon ed., Postwar Japan as History,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4-63.
- [24] 尾崎真理子『大江健三郎全小説解説』、東京: 講談社、2020年、201頁。
- [25] 大江健三郎「ヒロシマー九六〇」『中国新聞』1960年8月7日、1ページ。
- [26] 山本昭弘『大江健三郎とその時代——「戦後」に選ばれた小説家——』、京都: 人文書院、2019年、103頁-109頁。
- [27] 大江健三郎『ヒロシマ・ノート』、東京: 岩波書店、1965年、145頁。
- [28] John Whittier Treat, Writing Ground Zero: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the Atomic Bomb,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4.
- [29] John W. Dower, “Peace and Democracy in Two Systems”, in Andrew Gordon ed., Postwar Japan as History,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1.
- [30] 大江健三郎著, 许金龙译《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年, 174頁。

- [31] 大江健三郎著，许金龙译《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155页。
- [32] 山本昭弘『大江健三郎とその時代——「戦後」に選ばれた小説家——』、京都：人文書院、2019年、312頁。
- [33] 大江健三郎著，熊淑娥译《来自“晚期工作”之现场》《作家》，2010年，（8）：5页。
- [34] 大江健三郎《大江讲评》，彭小妍编著《大江健三郎——从自我到世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1年，41页-60页，115页。
- [35] 大江健三郎著，郑民钦等译《政治少年之死》，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40页-42页，123页。
- [36] 大江健三郎著，许金龙译《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91页-92页。
- [37] 大熊信行「日本民族について」『世界』1964年1月号、74頁。
- [38] 丸山眞男『増補版 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東京：未来社、1964年、585頁。
- [39] 京極純一「政治文化のワンマン探検隊」『中央公論』2001年1月号、240頁。
- [40] 戦後思想研究会『戦後と反体制』、東京：桜楓社、1970年、18頁。
- [41] 大江健三郎著，郑民钦译《康复的家庭》，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17页。
- [42] 野口武彦『吠え声・叫び声・沈黙——大江健三郎の世界——』、東京：新潮社、1971年、56頁。
- [43] 富岡幸一郎・大江健三郎「インタビュー文芸時評 小説の読み方作り方 大江健三郎と『キルプの軍団』」『すばる』1989年2月号、292頁-307頁。
- [44] 熊淑娥《日本象征天皇制中天皇、政府与国民关系探究》《日本问题研究》，2020年，34（3）：50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